

# 柯庆施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节录）

何泉达

为使全面正确地认识柯庆施，本文将鲜为人知的柯庆施日记、书信、档案、自传、孩提习作、相关人员口述等资料予以条理。时间起自1902年柯庆施诞生，迄于1919年因受新文化运动熏陶，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声援“五四”爱国学运。

## 一 我是徽州人

公元1902年7月10日（夏历六月初六），柯庆施出生在安徽歙县南乡的水竹坑（又称竹溪）。他的降生，使婚后愁眉日蹙的柯临久终于块垒坠地。因为依照谱牒，新安柯氏第四十一世不仅添了承继之人，而且自这一世起，按“竹溪柯氏宗祠”寝堂中新撰的联句，水竹坑有了依每字顺序排行辈分的领头羊。这幅十六字联句写的是：“尚友敦伦以昭祖德，继恩崇本乃振家声”。而这之前柯临久尽管曾经先后有过两个儿子，但在柯庆施诞生之前都相继夭折了。

新安，古郡名。汉代以前是山越人居住的地方。三国时期称新都郡。魏晋南北朝时改成新安郡。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淳安以西、安徽新安江流域，祁门及江西婺源，是皖浙赣三省交界处一片美丽的丘陵盆地。隋唐五代称歙州，宋徽宗赵佶于宣和三年（1121）易名徽州。这之后800多年州名不变。方志谓此处“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sup>①</sup>。顾祖禹说，其地“土沃民殷，资储易给，控御三方（江南、浙江、江西），战守足恃”<sup>②</sup>，并且发源了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的宋代理学，是程（颢、颐）朱（熹）三哲人的桑梓之邦。宋理宗赵昀则更为歙县的“紫阳书院”题额，从而促使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因此，徽州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相对其他地方，既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平静世界，更是一个具有完整性的文化地理范围，而且这里堪称是一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毓秀宝地。

因此生于斯者每以自己是徽州人而骄傲。柯庆施生前常对子女说：“我是徽州人”，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兴许缘于歙县文脉的源远流长，南乡杞梓里于清嘉庆三年（1798），诞生了一位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sup>③</sup>。就在王茂荫被马克思刮目相看后的半个世纪，与他同属歙县南部三十三都五图<sup>④</sup>的小同乡柯庆施，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有幸见过列宁的人。

那是1922年初，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及远东革命青年会议，柯庆施代表南京团出席，“并籍此留莫斯科学习”，至当年夏季回国。<sup>⑤</sup>就在逗留莫斯科的这段时间，柯庆施在某次会议上见到了列宁。会后他同与会的旁人一起出门送列宁上了车。

这对徽州小同乡，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与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先哲产生关联，无疑纯属巧合，并且，从现象上看，应当说这个巧合没有什么惊世骇俗处。但透过这种偶然，折射出的内在，却是古老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必然。

关于柯庆施见列宁之事，前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于2000年5月28日如是说：“一九三九年初在延安，调我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

<sup>①</sup> 《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sup>②</sup> 《读史方輿纪要》卷28《徽州府》，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27页。

<sup>③</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83号脚注中说：“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斥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7页。

<sup>④</sup> 《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都鄙》，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案：都、图，明、清时基层行政区划名。图下分十庄，图有地保；图上设都，相当于区或乡。

<sup>⑤</sup> 见柯庆施《自传》，藏北京中央档案馆。

明任部长。副部长是柯庆施同志。听王明说，党内现在只有柯老见过列宁。”

因为有一段经历，毛泽东在党内称柯庆施为“柯老”。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的曲琪玉，2000年2月11日就此称呼向疑问者释疑道：“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叫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

原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在2000年5月12日则对柯庆施曾经见过列宁的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和评说：“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我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柯老是副部长。大家都知道党内同列宁握过手的有柯老，可是他从来不讲。他从来不讲自己过去的成绩，这一点是柯老很好的一点。”

柯庆施的家乡水竹坑，一称竹溪村，它蛰居黄山余续的问政山脉中。村前水岭，是组成问政山脉之一者。水岭间有华源，当华源奔出水岭泻入峭壑，随即潺湲竹溪桥下。《歙县志》载：

竹溪桥，在水竹坑，明隆万间（1567~1619）建。高五丈，广三丈，修十余丈洞门，通水处亦修五丈。清同治五年（1866）洪水冲圯。光绪二年（1876）里人柯观察铭<sup>①</sup>倡修，族众同输助，四年（1878）告成。铭自为记。<sup>②</sup>

这里的“铭”者，字受丹，他是柯庆施的叔祖父。筑桥通便利，世称积善，柯铭此举，当对水竹坑柯氏之功德做了一次“彰著”。

过了竹溪桥缘溪行，山路下，溪水畔，一前一后，静伫两座单间双柱石牌坊。一突儿，山路东转九十度，又一座石牌坊兀立。此时，抬望眼，不远山坳蓊郁处，依稀粉墙黛瓦参差，一道唤作蔡水溪的小溪由东向西，从那里淌游而来。循溪蹒跚，随青山绿野中隐绰的秦砖汉瓦朗然凑集，水竹坑便渐渐展露出来了。

入村处一丛接一丛的高松大柏和枫香树，是水竹坑村落的屏风。这片水口林，据传，由距今700余年的新安柯氏第十六世柯六禄辟土拓种，其意在藏风聚气。柯六禄又在村口手植一棵银杏，它已成为南宋遗迹，更是水竹坑发祥之初的信物。

以银杏为村口标记的水竹坑，前临溪水，后有靠山，山环水绕，既曲折含蓄，又不开门见山而步步入胜。这种静卧于山峦包绕之中的格局，不仅应了古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境，更恰显聚族而居的柯氏祖宗看重风水，冀望村落地气旺盛，族人科举腾达，杏林得意的愿望。

据明人凌迪知所辑《氏族博考》厘正，柯氏始于二源：一、春秋吴国公子柯卢之后，二、后魏鲜卑族柯拔氏去拔改为柯姓<sup>③</sup>。柯庆施远祖柯颖属第一类，唐末兵燹，卜居池州建德县，此之前身处何方，今已无考。

凌迪知的《万姓统谱》又载：“唐柯颖”，官至“尚书郎”<sup>④</sup>。家乘则谓，颖子柯海、柯渊，宋时徙徽州绩溪和歙县，二地柯氏由是奉柯颖为“新安一世祖”。

徽州既诞柯氏，繁衍自在必然。

当柯颖之后人脉延续至十五世柯正三（即柯安国，别号“南坡处士”）辈，柯氏又分出一支迁往歙县南部的的水竹坑，时在南宋绍定四年（1231）。这事缘于北方游牧族逐鹿中原，“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sup>⑤</sup>的兵荒马乱年代。史载，“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余里无烟舍者。州县无官司，比比皆是盗贼”，而安徽则成为“流移”者的“乐国”，“士大夫往往具刺敬谒于”当路，“狼狽而来者得以暂安。”<sup>⑥</sup>

<sup>①</sup> 观察乃官名观察使之略称，源于唐世，阶衔为五品以上正三品以下。清代俗称道员（台）为观察，是省以下、府以上一级官员。主管范围有按地区分者如淮扬道，有按职务分者如盐法道。柯观察铭，即柯铭。

<sup>②</sup> 《民国歙县志》卷9《营建志·津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sup>③</sup> 《氏族博考》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页。

<sup>④</sup> 《万姓统谱》卷3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

<sup>⑤</sup>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573页。

<sup>⑥</sup> 《三朝北盟会编》卷134，《炎兴下帙》3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977页。

从此寒山转苍翠，依依墟里起炊烟。

但水竹坑柯氏的真正崛起，当始自清光绪年间倡修竹溪桥的三十九世孙柯铭。

《歙县志》是如是说的，光禄大夫：“柯永芳以曾孙铭赠，柯茂洪以孙铭赠，柯华辅以子铭赠。”<sup>①</sup>而此之前，水竹坑柯氏则悄无声息。由徽州休宁人陈栌等编纂，刊刻于元代中期（延祐三年，1316）的《新安大族志》所载程、鲍、方、殷、俞等76个望族中，唯独不见有柯氏一族征入，是为资证。

光禄大夫，唐之前与谏大夫、太中大夫等，同是掌握议论的僚官。俸禄：月谷100斛，一年1200石。演变至清代，已是文职封赠之阶，没有实际意义，属名誉之称。初为正一品阶，不久即改为从一品。朝廷常以此虚阶铨序职事官的劳绩而诰封被铨序者已故之长辈，类如今天的“名誉”、“追授”之设，人们视此为一种张扬门庭的荣耀而已。

那么，得以使柯永芳等诸前辈被诰封为光禄大夫名声的柯铭，其“功绩”又如何？史云：

铭，字受丹，国学生，援例铨叙通判，投效江苏大营，晋同知，旋保知府。光绪己丑（1889），李文忠公经营海军，特疏调至直隶，委天津武备学堂总办。黄陂黎元洪出其门。丙申（1896），江督刘坤一委办南洋水师学堂。官至江苏候补道。<sup>②</sup>

原来柯铭在清光绪朝以国学生的身段，曾铨授四品顶戴，并一度迁乔直隶，供职李鸿章的麾下，为他掌管中国第一所培养近代陆军人才的军事院校——天津武备学堂；当支持维新变法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营南洋水师学堂时，又受招于刘营执掌要职，为中国海军的组建和成长，多所贡献。及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的床下都督黎元洪，亦出自柯铭的门下。论此“劳绩”，堪称赫然。所以，方志在后来论黄数黑，对柯铭三代中的事迹推本溯源，亦是理所当然。

《歙县志》首叙柯铭曾祖柯永芳的人品曰：

柯永芳，字觐兰，水竹坑人。性刚直，慷慨好义，尤笃宗族。岁歉，即发粟平糶以济贫乏。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饥，人食草根树皮几尽，出积粟以振不足，复往余邻境，全活甚众。至修桥路，施茶汤，善不胜举。<sup>③</sup>

接着又叙述了柯铭的父亲柯华辅之行状，文曰：

柯华辅，字翼之，竹溪人。家藏唐雷威雌琴及宋元来名琴数十。金陵马搗材时号国工，华辅与论音律，穷极奥妙，互相推重。咸丰癸丑（1853）后，襄治南乡团务者八年。庚申（1860）夏，太平军自淳安来，华辅督乡兵御之六甲岭，拒守五昼夜。太平军由间道入竹溪，其妻王氏骂贼死。后依曾文正，任采访忠义局事以终。工诗，有集。<sup>④</sup>

父、祖之后，《歙县志》再对柯铭的兄长柯钺的事迹，彰著了一番，文曰：

柯钺，字晓荃，华辅子。道光己酉（1849）拔贡，廷试一等第二，以知县用，改选桐城县教谕，旋中咸丰辛亥（1851）恩科举人，官刑部主事。在都留心经济之学，尤负时望。咸丰十年（1860）协防京城，以功加五品卿衔。旋考取军机章京第一。丁内艰回籍。母王氏殉难，抚膺矢报，会曾文正公罗致戎幕，每治军事，动中窾要，知兵宿将咸折服。然秉性刚直，与事辄与文正断断辩论，文正深器之，常曰：“柯君清才正气，人所不及。”积功加四品卿衔。同治三年（1864），丁外艰，自侍疾。时已病。及是益剧，呕血斗余，昏愤中犹呼杀贼。逮金陵克复，病故营，次得旨，赠太仆寺卿衔，荫一子县丞。<sup>⑤</sup>

兴许柯铭的祖父柯茂洪，相比较于长辈和子孙，鲜有可圈可点处，《歙县志》仅以“柯

<sup>①</sup> 《民国歙县志》卷5《选举志·封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sup>②</sup> 《歙县志》卷7《人物志·忠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sup>③</sup> 《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sup>④</sup> 《歙县志》卷9《人物志·士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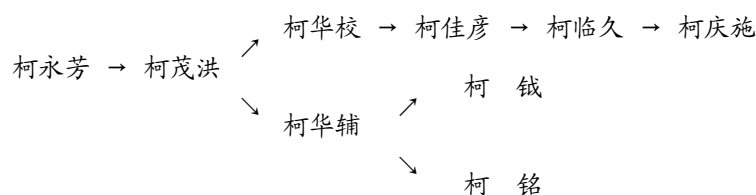
<sup>⑤</sup> 《歙县志》卷7《人物志·忠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

茂洪以孙铭赠”“光禄大夫”数字外，对其颇是吝啬笔墨，包括柯铭的二伯父柯华校更只字不提。然而后来的历史，恰恰是柯华校一支产生了柯庆施，由此把水竹坑柯氏推向诚可炫祖耀宗高峰。所幸，尝存柯氏家乘的片言只字，尽管不关其间，却仍可以为柯华校一支的人脉，作些拾遗。经扒疏，可作以下纪：

华辅之二兄华校（1802—1857），清例授登仕佐郎，为从九品官阶；子佳彦，荫江苏补用县主簿；孙临久，字广菖（1876—1942），又名日昌，号曙东，晚清国学生，暇时自习岐黄，赓续新安医学遗风，晚年常为村人号脉施药；曾孙庆施，初名尚惠，又名思敬、怪君、何乃康，号立本，职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综上所述，笔者归纳志乘记载，且将水竹坑柯氏永芳至庆施（新安柯氏三十六世至四十一世）的世系，以图表形式择其要而臚举之：

### 新安柯氏三十六世至四十一世传承图



## 二 问学乡学校

就在柯庆施来到人世的前一年，因应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占领，迫使已经走到历史尽头的中国封建政体上层，面对即将签署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内省。

水竹坑虽地处偏隅，但在“方今时局多艰，储材为急”的大背景下，同样被这股时潮所激荡。1910年，34岁的柯临久终于从心底喷涌出一腔救国激情，他以水竹坑柯氏族长身份，祭起黄遵宪倡言的“救中国之不二法门”，改竹溪柯氏祠堂为新式学堂，延聘外地名师，创办“竹溪柯氏私立继述小学校”，纳生聚徒，以“醒民强国”为宗旨，自任校长，矢志成就一番对得起列祖列宗的事业。

这位在水竹坑首创新式学堂的乡绅，此前被李鸿章的儿媳柯莲子聘为芜湖家中总管，至25岁返归故里。及回家乡，即刻擘划改变当地产业结构的蓝图，提倡种茶养蚕，以为通商之资本。这在当时是十分前卫的举措。

柯莲子是柯庆施“本家的姑妈”，<sup>①</sup>掌管李家在芜湖的产业。当时芜湖有上长街、下长街、上二街三条主要商业街，李家占了两条。李家也有不少藏书和报刊，柯临久工作之暇就倘佯在这些白纸黑字之间，尤其是反映当日时势的报刊更字字细读，这使他办学之前不仅有会走出偏僻的小山村，来到承受西潮风气激荡的城市生活和学习，而且思想颇为开明。办学之日，柯临久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习俗，在宗族气息浓烈、贞节牌坊林立的人文环境中，决然立下适龄女子也可入学的族规，引领当地新风尚。不少外村人闻此鹊声，比肩接踵，纷纷挈儿带女前往叩请启蒙，一时，交通不便的水竹坑俨然是歙县南部的教育中心。

幼时的柯庆施后脑勺上还拖着的一条细长马辫，在他就读“继述小学”时，照旧悠悠悠悠地甩动着。他曾说：

小的时候打着一条小辫子，一群脑后都拖着一条小辫子的同龄小伙伴在竹林中嬉戏玩耍躲迷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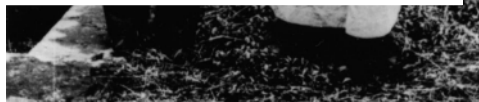
兴许出于人的这种生命象征，又兴许因为4岁之前，朝朝由生母方氏梳理的缘故，这

<sup>①</sup> 见柯庆施《自传》，藏北京中央档案馆。

根发辫在柯庆施的记忆里留下的印痕显然深刻。



柯临久与续弦洪氏摄于水竹坑老屋前（1929年2月） 瞻远 摄



方氏是歙县磻溪人，1873年生，长柯临久3岁，1902年生育柯庆施之后，身子骨一直孱弱不爽，柯庆施4岁那年，终因痲病沥血，过早离开了人世。

孩失其恃，幼丧所亲，这在柯庆施稚嫩心田烙下痛苦印记，以致他在后来对膝下忆及往事时竟难以遏抑思母情愫，他神伤地对孩子说：

一天，我妈妈坐在院子里为我打辫子，她突然把我从身旁推开，吐血了。之后我被送到外婆家住。后来，母亲病故。

方氏辞世，续弦洪多云是歙县梅溪人。她比柯临久小整10岁。或者年轻端庄的新人十分可人，或者积贫积弱的中国大时局刻不容缓地催人奋勇向前，壮年丧妻的柯临久很快弥合了失去元配的创痛，一头扎入富于挑战的新式教务，同时又腾出时间，把着长子柯庆施的手临帖习写大块方字，将一片添犊深情融入教授“永字八法”的实际行动中。柯庆施回忆作

这门功课时的情景说：

那是一点都马虎不得。

就这样，9岁的他进入了父亲创办的学堂开始接受训蒙。那是1911年的事，直至1914年12岁毕业，柯庆施始终在父亲的羽翼之下。

继述小学校是初等小学，4年制，有正规毕业证书，学历公认，学生毕业后可去任何一所高级小学继续读书。由此，足可管窥学校的教育质量非等而下之。这点，从柯庆施在4年启蒙期间所作12篇作文中可以得到印证。

现在能找到柯庆施所写第一篇作文题目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命题源自《论语·卫灵公》中的一段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sup>①</sup>

“恕”，按字面解即“如心”，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具体讲，当自己要对他做什么事时，先想想自己是否愿意遇到这事，如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这里渲染的是忠恕之道，他要人们眼里有他人。懂得世界非我一人生活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我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我心我性所不愿承忍者，绝不能强加于他人。对于孔子这一讲求宽容的思想，蒙童柯庆施的感受是：

人生之最可耻者莫如不恕。不恕云者，不能以己之心度人心之谓也。夫至不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势必以所欲之事施于己，所恶之事加诸人。揆厥由来，举凡呈其暴虐戕害人之身，流于盗贼攘夺人之物。皆因心之不恕以致于此，耻孰甚焉。昔孔子有言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也，恕道也。岂不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显然，上述124字中，柯庆施在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从阻恶层面单刀切入，进而表达了对极端个人主义鄙视的态度，认为自己应以“恕”字奉行终身。据以探视，文中一句“岂不可以终身行之乎”，透露柯庆施在尚为幼小的心田，已朦胧地埋下他之一生，将与人为善为准绳的种子。

<sup>①</sup>《论语注疏》卷15《卫灵公》。《四部精要》本第2册第25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这篇作文写于何年，现已无考，它载于柯临久保存的《国文誉清》。该册为宣纸线装本，封面左上角用毛笔书写“国文誉清”四字，下方盖“柯尚惠”红色印章。册内毛笔字迹为小学生作业，其余 11 篇均缘于此，昔各篇都未注写成时的日期。

第二篇作文题目是《伯夷叔齐不念旧恶论》，总 154 字。此文较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篇，思想明显深了一步。全文见次：

恶者，有过之谓也。旧恶者，改过自新之谓也。然则人生于世，不患其有过，特患不能改。过而不改，将终身为过中人。不几见绝于夷齐乎。盖夷齐之于恶人，既不与立，又不与言，似觉拒人太甚矣。然夷齐恶恶之心虽严，而容人之量最宽。推其意之所在，以为人有恶吾必恶之，人有恶而能一朝悔改，吾当谅之是恶。其恶非恶其人耳。夫如是，非至公无我之圣人，其谁能之。夫子称其不念旧恶，岂无故哉。

伯夷、叔齐，商朝所封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二人一度交恶。其父在世，欲传位给弟叔齐，及乃父去世，叔齐让位于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遗命啊！”兄弟俩为了表明不念旧恶，都不肯即位而双双外逃。这时，他们得知待人宽容仁爱的西伯姬昌（周文王）去世，子姬发（周武王）不葬父尸，却用战车载其神主，率军东征讨伐曾幽囚姬昌于羑里的商纣，于是直奔军前。伯夷、叔齐谒武王而勒其马缰谏阻道：“父死不葬，却大动干戈去打仗，这难道是孝的行为吗？身为臣子，却要去杀害国君，这难道算做仁德吗？”及周武王摧毁无道的殷商统治而建立周朝，天下归附，伯夷、叔齐又认为周武王此举是可耻事。为了表示对殷商忠义，他们不再进食周朝粟糗，隐居首阳山，靠采薇充饥，直至饿死。孔子评价伯夷、叔齐这些行为道：“伯夷、叔齐，不念旧恶”<sup>①</sup>，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sup>②</sup>。

柯庆施读伯夷、叔齐事迹，从他所抒发心得的字里行间，可见思想的骏马并没被孔子的“求仁而得仁”之说羁绊，他很有原则，善恶分明，认为“恶”就是“恶”，不能因负“恶”之人改过自新，犯“恶”之“事”就可一风吹，只不过自新之后，“恶”没有把曾经犯“恶”的人“变恶”，所谓“其恶非恶其人耳”。因此，“人有恶而能一朝悔改，吾当谅之是恶”，但不能因此抹去曾经犯“恶”的事实。柯庆施这一富于哲理的思辨，无疑相比照这之前表达的欲以“恕”字奉行终身的意念，成熟许多。

一个 9 至 12 岁年龄段的学童，嬉耍之余又拨出心力于哲理的汪洋徜徉，这在同一年龄段的孩子中不为多见。所以，在 1913 年 7 月 1 日，由校长柯临久签发的修业报告单上留下下列 26 个颇具历史价值的文字，便不足慨叹了。其文曰：

学生柯尚惠，三年级（上学期）总平均分数：捌拾四分四毛。列入甲等。

在柯庆施领到初小三年级上半学期的上述成绩报告单后又一年零六个月，一张“歙县私立继述初等小学校”的毕业证书颁给了这位“甲等”生。文凭签发日是 1914 年 12 月 30 日。

这之前，柯庆施所写的另外一些作文，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有：《水名盗泉孔子不饮论》、《乐羊子拾遗金於路论》、《体欲常劳论》、《室中宜常洒扫论》、《读书当夜以继日论》、《管仲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论》、《岳飞论》、《伍子胥论》、《介之推不言禄论》等十篇。

其中《管仲论》一篇虽 106 字，今日读之，尤仿佛见到一位血脉喷张的英雄童子忽然兀立眼前。柯庆施在文中颇具“时论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sup>③</sup>之气派。他挥洒道：

世皆称管仲为仁人，吾谓管仲非仁人也。何以知之，管仲为齐桓之功臣，而其先则与召忽同事子纠。迨桓公既杀子纠，则仲与忽皆为子纠臣，当随子纠死。乃忽死而仲生，贻后人以口实犹不足怪。所可异者，仲不但不死，而又为桓相。忘君事讎，存心太忍。谓之不仁，谁曰不矣。

管仲是春秋时期重要政治家，曾辅佐齐桓公制服周边小国，又用“尊王攘夷”口号讨伐

<sup>①</sup> 《论语注疏》卷 5《公冶长》。《四部精要》本第 2 册第 2475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sup>②</sup> 《论语注疏》卷 7《述而》。《四部精要》本第 2 册第 248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sup>③</sup> 《晦庵集》卷 56《答方宾王》

蛮夷，北面联合燕国击败北戎后复联合其它国家制止狄人侵扰，南面联合鲁、宋、郑、陈、卫、曹等国，讨伐蔡国和楚国，实现称霸中原意愿，使齐桓公首开春秋时期的霸主基业。但柯庆施所撰《管仲论》，议事对象不在此，落笔在《论语·宪问》中子路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上：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sup>①</sup>

这段文字的背景大体如次：公元前 697 年，姜诸儿立为齐国国君，是为齐襄公。襄公登基，政令朝三暮四，导致国势不稳。其弟公子纠与公子小白怕罹祸而出逃。管仲和召忽保护纠适鲁，鲍叔牙保护小白适莒。公元前 685 年，内戚公孙无知弑襄公，继尔，无知又被齐人戮，齐国无君。纠与小白争国君。鲁庄公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不想被住在莒国的公子小白抢先，是为齐桓公。桓公起兵迎击，鲁军大败，桓公胁迫鲁庄公杀公子纠。公子纠既歿，召忽自杀以殉，管仲却归服桓公，助桓公成为中原霸主。

子路问孔子：管仲改换门庭归服其主的政敌，且担任宰相，这种行为应当看作事君不忠而不应归之“仁”吧？

孔子不以为然，说：桓公不靠武力多次召集各路诸侯会盟，所以有这样的结果，都是倚重了管仲使用仁德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

孔子言论，向被后世视作行动圭臬。但柯庆施却在《管仲论》中表现得特立独行，他开门见山说：“世皆称管仲为仁人，吾谓管仲非仁人也”。“忘君事讎，存心太忍。谓之不仁，谁曰不矣。”直逼孔子的“如其仁，如其仁。”

### 三 在省立二师附小的日子

出水竹坑西行约百里，是个神话与奇人互出的地方。这就是柯庆施结束乡学校启蒙后的神往之地，别有洞天的休宁县万安镇新棠屯。这里座落着被后人誉之“皖南学府”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省立二师前身为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得许承尧大力支持，于 1913 年创建。校长胡晋接。校址有三迁，初藉紫阳师范学堂，继租休宁荷花池民宅。翌年 2 月更名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并创设附小；7 月，购万安新棠屯任氏故居作为永业。

许承尧、胡晋接，在中国近代史上均非等闲之辈。前者为“同盟会”成员、中国“末代翰林”之一，是当时安徽省著名缙绅，1906 年，与黄宾虹、陈去病、陈鲁得、江彤侯、汪鞠友等数十人组织“黄社”，被推为领袖，在“遵梨洲之旨（梨洲为黄宗羲字），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之”<sup>②</sup>名义下，与安徽候补道、“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暗度陈仓，从事武装反清活动，事泄，欲参本捕拿他们的安徽巡抚恩铭被有通家之好的徐锡麟刺死，徐锡麟则以刺杀巡抚罪由朝廷“捕得伏诛”，<sup>③</sup>布政使沈曾植趁乱将恩铭的奏稿销毁，大案得以消弭，许氏诸君子遂无恙。后者以精进程朱理学与博涉百家学说著称，尝于 1903 年始主持绩溪仁里“私立思诚两等小学堂”，开徽州新式教育先河，任校长时，为管徽州教育的郡督学。

就是这样两位站立时代前列的弄潮人，台前台后支撑省立二师，其垦草辟莱徽州教育的气象不难想见。

省立二师附小，分初等和高等两部。13 岁的柯庆施甫断蒙童生涯，已相当该附小高等一年级，因此，那年得以晋阶而直接从乡小学升入附小高等二年级。

从水竹坑到省立二师附小得靠步行，行程两天。首日至郑坑店就宿，次日过歙县县城抵岩寺后再安步当车数小时到达学校。

<sup>①</sup> 《论语注疏》卷 14《宪问》。《四部精要》本第 2 册第 25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sup>②</sup> 黄警吾：《黄宾虹在徽州》，《江淮文史》2003 年第 1 期。

<sup>③</sup> 《清史稿》卷 24《德宗本纪》，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59 页。

这一路上，可谓景色无限。

那变幻多端的峰峦，那踩着山石潺潺潏洄的溪流，虽说一个“美”字了得，但举目上下，鸟道连鸟道，毕竟人迹罕至。偶尔，从深山野渡里传出的一阵粗犷渔樵山歌，才让赶路人朦胧间悠悠洒洒脱脱地进入了宁静致远的境界：

手捧苞落糊啊，  
脚踩一盆火哦，  
除了皇帝就数我 ……

这声音响起来，仿佛田园诗人在吟哦，仿佛高人隐士在浩歌。然而斯其时斯其地的柯庆施，恐怕还未必领悟山歌中的意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山歌中唱到的“苞落糊”那玩意，是足以挠得他心头痒痒的。2002年，长女柯六六回忆有关“苞落糊”之事时说的一段话，似可引作当时场景的印证：

爸爸爱吃“苞落糊”，这是他儿时的主食，一生都吃不厌。妈妈会做，我也会做。

用玉米粉做成的糊糊，老家话就叫“苞落糊”。先把切碎的笋干丁放进清水中煮开，然后一小把一小把地往开水锅中均匀地撒入玉米粉，同时要用筷子在锅中不停的搅拌，以免结块。直到筷子搅起来觉得糊糊不稀为止，因为“苞落糊”是当干饭吃的，不是稀粥。老乡们一清早上山干活就带着一壶茶水一瓦罐“苞落糊”，直干到太阳落山，很耐饥。

“苞落糊”这话很形象，苞米粉撒落锅中成糊，便可以吃了，笋干丁是咸的，不用放盐。盛在碗里，吃的时候也有讲究：用筷子先夹碗当中的糊糊吃，吃完了再吃碗四周的。这样吃完之后，碗中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点残渣痕迹，十分有趣，是孩子们吃饭时的竞赛项目。

常言道：“行百步者半九十”。两天的脚程对于成年人已不算轻松，更何况孩子。所以，在柯庆施的远行路中就发生过一个插曲，这插曲令柯金煌没齿难忘，遍晓家人，前几年他儿媳又对柯六六的四叔提及：

柯金煌，年长柯庆施辈的同村族人，是当年护送村中孩子去省立二师的脚夫。那天途中歇脚，一学童任着性喊叫：“金煌公给我倒水来烫烫脚！”

柯庆施见状面露愠色，上前阻止道：“金煌公一路肩挑重担，又是长辈。你空着两只手行路，怎么能反过来要人家为你倒水洗脚呢？”言罢，柯庆施倒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端到金煌公面前。

入学后的柯庆施与许多由蒙童馆来的学生一样，国文程度虽好，但不懂数学。1915年3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雨。晨起盥洗毕排班。少顷入自修室整理书籍。有顷，食早膳。膳毕即上课，为习小字，每日写半张。次，历史。再次，算术，习分数除法。余因前时未曾学，故不能与其同班，仍复习除法。

这是一种压力，而且与日俱增，甚至关系升留级。3月16日，他在日记中情绪不无抑郁地写道：

余在自修中，先生免余曰：汝资格最下，若不用功将降入一年级矣。

“压力”有两种趋向：一种让人自暴自弃，一种让人奋发向上。对于柯庆施，“压力”则转化成了激励进步的力量。有件小事折射出了这个思变过程：

1915年3月21日星期日，他在日记中如是写：

上午温习一小时，习字一小时，静坐一小时。下午同至古城岩观鱼。如有犯上午之规者，下午不得同去。

古城山距学校约2里地，山不高而旖旎，名声达于遐迩，柯庆施心仪已久，但苦无道合者携游，现在能结伴称愿，怎不快人心。但他没有因此躁动得不知所以，相反，心旌显得异



乎寻常地平静，他说：

余见此语即入自修室温习。

致成此因，当然一则校方规定出游之前要以“自修”换取许可，但另一则似乎更重要，即柯庆施在同学中数学一科属最差，必须珍惜时间，倍加“用功”。否则有“降入一年级”之虞。因为这两种因素的相交，当向往既久的夙愿将立马实现时，他之神情没有过度亢奋，而是自觉地“入自修室温习”。

此时柯庆施，实际年龄 12 岁半，但理性与自制能力在这位乳臭方去的少年身上，表现不俗。这点，在他结束游玩的当天，体力已不胜疲惫却仍自觉记下心得，并于第二天交出作文一事上，复可管窥。

文如其人，这篇题为《日曜日游古城岩记》的游记朴实无华，读来笔法虽不脱稚嫩，亦不失少年老成的气息，此特予选录，一念逝者：

古城，休宁之山名也，久欲往游，苦无良伴，独行踽踽，未免意兴索然，故未称之愿。兹值三月，天气清明，又逢日曜，毕、黄二师仍率诸同学往游，余亦从焉。此山距校约二里，初行至其麓有一亭，曰半亭。亭外有石，刻放生潭三字。其前，潭水甚深，鱼甚多，大者逾尺，小者数寸。师以饼投之，群鱼拍浪争食，其声啧啧焉。少息，复登山。行约半里至塔旁，余等入观之，已坏矣。欲至此休息，黄师曰：此中殊危险，不可久息也。急趋出。极目四顾，见小村无数，风景绝佳。又约行半里许，有一洞也，传朱元璋避难于此。入观之，内颇深。已而复行，行仅数武<sup>①</sup>，见二石相抵，如门焉，上刻字无数，摩娑之乃复行，至亭内少息，即回校矣。余足力虽疲，而游兴尤未减也，故归而记之。

理性与自制力，是形成高尚人格的重要要素，具有之，遇事方寸不乱方向明，而它之形成，在日后，更深深裨益了柯庆施的从政生涯。但自幼形成理性与自制的品格，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亦不应忽视。正是这个品格，使当年甫入省立二师附小时还是数学最差生的他，一年多后，却能作如是谭了：

数学一科最要莫如明理。凡数学之定理公式等必先求其理，理既明则永远不妄。

此余经验也。<sup>②</sup>

显然，这是勇闯“留级关”之后溢于言表的喜悦，是胜利之时的内心独白。数周之后的 1916 年 6 月 22 日，学校出具“柯尚惠本学期在校状况通知”，将其甄别于差等生而升入乙等生的行列，则道出了柯庆施之所以有上述这番数学学习之经验谈的底气之由来。这份“通知”上写着：

学业分数 七十分 操行等第 乙等 受课时数 五五九时 缺课时数 〇

附告： 修学再求奋勉，尤宜注意整洁。

校 长 胡 晋 接

主 事 胡 亚 修

综合各课学业乃得成绩 70 分，虽然算不上甲等，但对于出身乡学校的柯庆施来说，在一年半内达到如此水准，已称不易。因为入学“附小”之前，他的知识结构毕竟不完整，属跛足形架构，只是进入“附小”之后，这一前期缺陷方趋纠正。据当时日记记录，柯庆施在省立二师附小所修课程约有 15 种之多，它们是：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图画、手工、体操、唱歌、英语、习字、说文、读经、声韵学等。

这些课程较之 1912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sup>③</sup>，多了自“习字”以下的四门课，可谓学业沉重。但柯庆施学来煞似滋味无穷，以英语与数学为例，他在

<sup>①</sup> 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国语·周语下》有“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句。柯庆施此处用“武”字，可见其国文遣词造句，古朴而不佞屈聱牙，不失汉唐散文遗风。

<sup>②</sup> 柯庆施日记，1916 年 5 月 30 日。

<sup>③</sup>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3 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 页。

191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说：

余初入本校对于英文一科颇短，故见上英文课时常有恐惧之心。近来稍涉门径，故见上英文课时则心中觉非常爽快。

10月17日的日记则写道：

上午算术胡师云，吾尝见汝等对于算术一科皆不细心研究，此亦畏劳苦也之一端也。余自思，畏劳苦之一事乃今日学生之通病也。吾人若不从速改之，则将来安有益于社会国家哉？凡吾同学共宜勉之。

一门英语，一门数学，历来不被以馆为业的寒士重视。所以，若将传统蒙童馆较之中西之学兼习的新式学校，在知识面上，总脱不了捉襟见肘窘态。这种差别，在于省立二师，它的优势尤为明显。这不仅表现在省立二师之课程设置的多元，主要是众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还对时势的积极介入，并且引导学子放眼看世界。1916年5月29日的柯庆施日记，可援为这方面的明证。这天柯庆施写道：

国文：讲《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书。嗟呼！吾国当日若从曾纪泽言，则吾华今日亦必赫赫，有多树于世界，断不致如今日之中国也。惜当时之大臣皆眼光小而奸，致我华一沦于深沟而不能自强矣！可悲也夫！可慨也夫！

屈辱的历史，使柯庆施不能平静。省立二师附小的教育让他省悟：如果国人敢于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则吾华今日亦必赫赫，有多树于世界，断不致如今日之中国也。”

柯庆施要为“沦于深沟”的中华“能自强”，奋起搏击了。

#### 四 胡晋接的停学令

1918年，柯庆施16岁。这年他已是省立二师本科第五班的学生。之前，柯庆施曾躬身自问：“吾等负笈来此为何事耶？”答：“以为将来求生活之准备。”所以学习时“必专心于学问。”<sup>①</sup>

目的既明，那么这年暑期探家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既有的“学问”所作的一次检验，结果又如何？且看柯庆施暑期结束后所作的《记暑假期内之见闻》：

今年我乡发生一种牛疫之症。余于其初发时已亦劝其预防并示以方法。而一种愚民，谓此病乃一种瘟神，预防无益，非先除瘟神不可。是则故接菩萨之术行矣。呜呼！何其愚也！

牛疫，是种常见的耕畜病。因此当疫情忽至，柯庆施尽管将自己努力学得的“预防”之“学问”示与人，却无法撼动积习。人们依旧行“接菩萨之术”。

柯庆施面对严峻现实没有畏俯退避，没有学会圆滑深沉。他迎刃思索，并在这一学期临近结束，将兴奋点条理成《对于吾徽教育意见书》。文曰：

吾徽之兴教育二十余年矣，所得之效果盖无几也。长此以往不求改良，则教育之无进步可知也。吾徽之同胞终处于黑暗之室，其不幸孰能及之，呜呼怜矣。吾愿徽属地方人士，其速联袂而起，设法改良，使固陋之山陬，成文明之乐土。不揣卑陋，敲陈管窥，更希诸君有以教之。

吾徽教育须改良之处颇多，今惠（即柯庆施）以根本上之亟宜研究者略述于后：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吾徽之国民学校，其内容大半为私塾改良，故一切学校用具皆不完备。此尚其次也。更有名为民国学校而实则其为教师者，思想不能革除其守旧观念。故儿童之初入校也，师必先课以“三字经”、“百家姓”等。及其稍长，则课以“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不知旧教育之目的在功名，在文字。盖欲得功名，必先注意文字，且其文字多尚浮华，既不能使儿童学以应用，且有损于儿童之精神。新教育则反是，其目的在致用。故所读之书，必以实用为主体，其文字不求华

<sup>①</sup> 柯庆施日记，1916年10月13日。

美古奥，儿童学之，能使其应社会之要求。此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也。亦吾徽教师之宜注意者也。

教育儿童须注意发挥其本能。本能者，天赋之才能也，人皆有之。然教师不从事发挥，积久则渐次失其用。如人各具有能言之本能，假二、三岁时，不设法教之引导之，则具长成，必为一哑人。故儿童之本能，如身体发达之本能，及各种学术之本能，必须发挥之，不可压制也。虽然本能有善恶之分，故发挥时又不可不注意去恶而从善也。此其最要也。

余如为教师者，须自问能否有充分智识，以应儿童之要求。是否有能教授儿童，使其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此乃为教师者之必要反省条件也。

《意见书》着眼点虽在教育，但字里行间无处不激扬新思想对旧习俗的横决，是篇战斗檄文。这篇檄文标志，柯庆施已经由一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爱国少年，向着思想觉醒的青年迈出了踏实一步。而他能有如此这般长进，又当脱不了时局的孕育。

1918，一个殊称敏感年份！这年，去陈独秀倡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整3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刊于《新青年》，引出后来“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一篇《吃人与礼教》的论文；12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更代表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一场大风暴经过3年酝酿，经鲁迅的催生和李大钊的点拨，眼下只欠导火索引燃了。

在山雨欲来的时候，称为“皖南学府”的省立二师，其实早已经风樯阵马。1916年4月22日，柯庆施在日记中写道：

胡校长说：近日各班皆出学术研究杂志，此事是最好之事，可以为课外之补助。但议论须以正确为主，不可空泛云。

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初始第二年，作为运动内容之一的思想大争鸣，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已涌动于此。

“胡校长”即胡晋接，安徽近代教育家。他顺应维新潮流，在主持省立二师期间，提倡教育与生活相结合，主张以教育手段开民智、育新民，为徽州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当时潮流更滚滚向前，却犹豫彷徨，止足不前，甚至唱出反调。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刊载《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一文，引用他的讲演辞反对节育观念即为例证，胡晋接是这样说的：

最新潮流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毛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种灭国亡”是也。

……

而又有山额夫人<sup>①</sup>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种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种。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种。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子孙，从此绝矣。<sup>②</sup>

就是这样一位杂新旧于一身的校长，面临治下各班皆出“学术研究杂志”之事，表面要求议论正确，不作空论，实质并不赞成。他不能容忍这个思想争鸣的学术民主气氛。3天后，胡晋接更通过教员程铁华向柯庆施等喊出了停止令。柯庆施在4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程铁华先生谓吾等曰：“汝等发起之学术研究报，不可积极进行。宜俟毕师来再议，因汝等国文程度太浅故也。”

胡校长不让办“学术研究报”，不等于防范得了学术民主的时代潮流漫过堤岸卷地奔来，不等于阻止得了学生争分夺秒地埋首报章。柯庆施尝说：

<sup>①</sup> 马格利德·山额夫人（1883—1966），美国著名节制生育运动领袖。1921年冬天，曾到北平、上海等地进行节育理论的巡回宣讲。

<sup>②</sup> 转引自鲁迅：《新的蔷薇》注8。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5页。

早膳后阅报片时。因思报章者所以发布新闻介绍学问者也，凡国内之政事之若何，及世界之大势如何，若不备于一纸，[岂]一览而可知矣？故凡阅报者，既可知天下之大势，又可增进智识，其益大矣。<sup>①</sup>

真是曲径通幽。年轻人，脑子快。直线被堵绕个弯，通过阅报途径，变有形为无形，同样可以把握时代脉搏，同样可以思想交锋，且将“学术研究报”办在心田，从而在根本上承受思想自由之熏陶。所以，有形的“学术研究报”虽被学校当局扼杀于摇篮，但无形的“学术研究报”在报章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推波助澜下，不减澎湃势头。柯庆施的《对于吾徽教育意见书》之挥就，应是这个情景的映照。而即使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读这篇短文，依然能感受到它夺人的思想光彩和战斗锋芒，从中遥想当年皖南省立二师表面平静之下奔腾着的那股不平静的思辨激流。

由于柯庆施在省立二师摒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义勇，因此紧踩时代节拍。而当时节拍从表面看似似乎显得嘈杂：

1916年6月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建立，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1918年5月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订立，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

1919年2、3月间，曾被袁世凯收买过的《神州日报》，在“学海要闻”专栏多次发表《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之、陶履恭、刘半农等，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

“半谷通信”为张繆子所写。“繆”，半谷也。张繆子即张厚载，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门学生，上海青浦人，兼《神州日报》记者，林琴南在五城中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时的学生。在“五四”前夕那场关于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的著名大论战中，受到过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的批评。此刻跳将出来，只因被林琴南利用。

3月4日，上海《申报》对张厚载的通讯又作了深度报道，云：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6日，再度报道：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

这两条“驱逐”和“辞退”的消息，虽属一时谣言，但一经《申报》登载，舆论哗然。

3月7日，柯庆施知悉后一时不明个里，愤怒至极，他将鸣镝直飞当时大总统徐世昌，疾言厉色道：

阅报，见北京大学教员陈独秀，胡适之等被逐出校一事，实有令人顿足呼天之慨也！夫言论自由已成为共和国之法律。且思想贵在发表。有思想而不令人发表则文明学术何由发达？何由进步？

徐大总统发此种命令实较冷血动物尤不如！尚安有总统之资格乎？虽然今日一般上等社会之人行此种恶劣手段者，岂仅徐总统一人哉！以吾目亲睹者，殆尚不知若干矣。呜呼哀哉！吾中国之前途诚为危矣！<sup>②</sup>

由于谣言是在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校长蔡元培《致〈神州日报〉函》<sup>③</sup>后方才攻破，所以，谣言澄清前，柯庆施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3月10日这天，他甚至愤愤地将自己名字改为“怪君”，以示勿忘扫除人世间形形色色“怪”现象，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sup>①</sup> 柯庆施日记，1916年10月21日。

<sup>②</sup> 柯庆施日记，1919年3月7日。

<sup>③</sup> 《蔡元培全集》卷10，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394页。

兴许是蔡元培致《神州日报》函的信息姗姗来迟；兴许是谣言继续在作祟；也兴许是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后厉行改革，使向以腐败闻的北京大学，气象大变，面目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而别处一时依然沉闷。

总之3月19日前，谣言风波对柯庆施导致的振荡一直未见消弭，在这股振荡波冲击下，柯庆施继更名“怪君”后，于3月20日又呐声喊：世道之“怪哉”！怪在“学术之言论”无自由。他在这天日记中写道：

呜呼怪哉，今之学术言论界也！夫学术之言论，其目的在其真理。今有二人焉，各执其言，论孰是孰非，不可知也，故必持互相辩论，则其是非自见而其明。其非者，固因己之言论不确，与是者无与也。而今之言论界则反是，非者辄恶者，必以种种手段报复之。故，是者辄受种种意外之事。呜呼怪哉！

连续地呼喊“怪哉”，似乎为一吐胸中块垒，快快人心。但柯庆施毕竟不是勇而欠谋的鲁莽张飞。在“谣言事件”中接连呼出几声“怪哉”的那一刻，他同时又在冷静思索此“怪”缘何而来？4月3日答案出来了：

居今之世，而欲得发挥己之思想，诚非易事也。其原因有三：一、政府，一般官吏之压制力太大；二、一般人民之智识太浅；三、古时恶劣学说之流毒太深。有此三因，故学术思想之所以不能进步也。孟子一生最在养气，故其有言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能“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柯庆施厘清造成社会“怪”现象层出不穷之“三因”，入木三分。他继而藉孟子“养气”语录，表明匡正时弊心迹，则又昭示自己已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耿待气质。

是秋，柯庆施年仅17岁。

17岁的柯庆施，从孟子那里汲取营养，并非乘一时之高兴，亦非卖弄章句辞藻，画个银样蜡枪头，虚荣一下，自慰一下，相反，是潜心静思所得。5月2日，他复将这个思考过程作了完整表述：

吾人读古今诸子百家之书颇多，足以高尚心思，奋发精神，增进智能，宏阔器量，皎洁言行，瑰玮气宇。愿欲追踪圣贤，继述英雄，以旋乾转坤，救国匡时，胥乎是赖。故吾国之国学，非尽在革除之例可知矣。吾国之国学，类多发展精神之学。吾人有轩昂之精神，然后有充分之智能，有远大之思想，而后有雄伟之事业。唯心唯物，主观客观，是不可不辩也。若偏重科学，则国学日衰，将见天下而成为机械之世界，而人类精神之作用绝无矣。乌可乎！乌可乎！学生时代者，吾人最难处置之时代也。凡为薰为莠，为石为瑜，为社会之精华，为人群之败子，莫不造基于此。故吾人处此为学生时代，可不慎欤？

“五”，在术数中属变数。《说文》曰：“五”，“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sup>①</sup>在记时纪事方面，五月则似属多事之月。

就在柯庆施写完5月2日日记后的第三天，亦即5月4日，一场震撼寰宇的爱国反帝学生示威，于天安门前爆发。消息传出，徽州大批爱国青年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队伍中，柯庆施自然是慷慨激昂的一员。5月11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表示：

近来山东、青岛二问题均大失败，京律学界大为愤恨，故有打死章宗祥、焚去曹汝霖居宅之义举。利国利民，实非浅鲜！而政府则听卖国贼之言，拟解散大学，死学生与株连大狱，诚无理之至也！本校有鉴于斯，特于今日开救国大会，讨论救国方法。后议决先电政府及各报馆，力求释学、保大学、争青岛。并函吾皖学界，请协力同求，假将来政府不能信吾辈之言，惟有牺牲吾等学界之性命。盖吾国今日政界中人，类多无能，直可谓为死人。农工界又乏智识，故惟学界最有希望。而今，若不极力争之，则将一落千丈，吾国之无日矣！将来时局若何，今尚未知。惟预备吾人之性命，以便

<sup>①</sup> 《说文解字注》卷28《五部》。《四部精要》本第3册第3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为国牺牲也。

柯庆施于年5月29日，加入了“徽州救国十人团”。这事值得纪念，他父亲为此精心保存下两张柯庆施当年的交费收据。一张长约三寸、宽约寸余、长方形油印收款格式普通纸，上用毛笔填写：

今收到团员柯尚惠君五月份储蓄费叁角正。此照。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徽州救国十人团具。

收据在“三角”二字上盖有“徽州救国十人团”负责人“吴国骅印”的正方形红色印章，约2公分见方。

另一张是宣纸，长约23公分、宽10公分，编号“救字第八号”。上书：

今收到团员柯尚惠君七月份储蓄费洋〇元叁角正。此照。中华民国八年六月。徽州救国十人团第一团具。

宣纸上所盖红色印章约二点五公分见方，印章为篆体字。“徽州救国十人团”字迹清晰。

当然，“救国十人团”不可能是一温良恭俭让的民众组织。曾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湖南桃源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王一知回忆说：“游行后，同学们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废寝忘食的编织毛织物，换得钱捐献出来。同时又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大家毫不犹豫的把箱子中新的或半新的日本料子的衣服亲手抛到烈火中焚毁。当然这时也有一些站在革命潮流外的书呆子。我们一见他就讽刺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们哑口无言含着羞愧的心情悄悄的溜走，也有经不起良心谴责跟着我们干的。”<sup>①</sup>

徽州“救国十人团”的活动，大体与此相仿。《申报》在六月十日的一篇通讯中说：“徽州学界先后组织救国十人团及国货贩卖部。屯溪茶务讲习所亦列队游行，举行露天讲演，散布传单，劝告商店抵制日货。”<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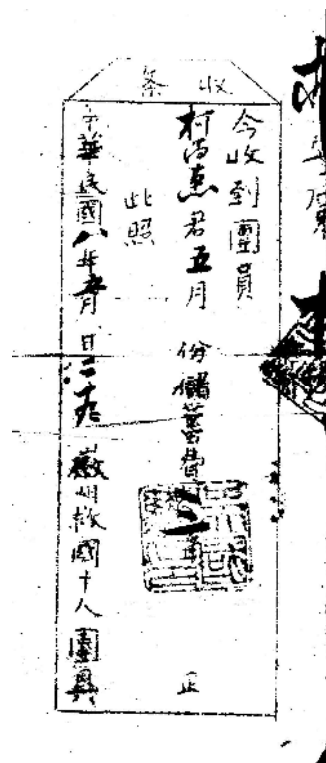
在历史大潮前仿佛冬烘先生式的胡晋接，出于中国人的良心，在5月11日召开了全校的救国大会，之后，对学生的进一步爱国举动却显得很理解。8月28日，他终于按耐不住心头焦虑，提笔给柯庆施父亲柯临久寄去一信，要言如下：

临久先生 大鉴：……令郎尚惠因思识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

弟 胡晋接 拜启 八月廿八日

信发出之前，国内形势似有吃紧，就在这危急时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责令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的柯庆施休学，理由仅仅“因思识一时误谬”。这对满腔救国激情的柯庆施无疑是沉重一击。

那么，被推入有生以来第一个坎的柯庆施，将如何践阵之后的人生旅途？



<sup>①</sup> 王一知：《五四时代的一个女中》。《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17页。

<sup>②</sup> 刘立凯：《五四一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载1919年6月10日《申报》，转引自《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1页。



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时的柯庆施

[作者简介] 何泉达，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